

第一章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一 不平常的春天

1. 少有的元旦社论

20 世纪 80 年代，全面改革展开以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从 1984 年到 1988 年 国内生产总值从 7171 亿元增加到 14928 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 1642.86 亿元增加到 2357.24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 3376.4 亿元增加到 7440 亿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535.5 亿美元增加到 1027.9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从 27.05 亿美元增加到 102.26 亿美元 展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 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①

然而 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76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对 1984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经济过热的现象继续发展。1987 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 年—1988 年国民收入增长 70% 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4% 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 200%；工农业比例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除了经济工作的失误之外，更重要的失误在于：一度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在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社会上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异常活跃，他们利用群众对物价上涨和一些腐败现象的不满，把矛头引向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外敌对势力又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施加影响。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中，对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改革开放把社会搞糟了，对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有人就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应该说当时的党和政府是比较了解和有所警觉的，也采取了一定措施。

只是后来发展到那种程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它在每年的第一天都有一篇元旦社论，这篇社论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89年的第一天，照例也有一篇元旦社论，但它却是一篇颇让人回味的社论。

这篇社论说 刚刚过去的 1988 年是难忘的。在这一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触目惊心。对于在改革的第十年遇到的严重困难和问题，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议论纷纷。

社论接着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它提出要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 惟有改革一途。倒退回去 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旧躯壳中，只能使中华民族重归贫弱，难以振兴。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答案决不是知难而退、半途而废，而是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的配套措施，继续深化改革。要使改革进入更深层次，达到确立新体制主导地位的目的，需要解决一系列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改革的确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在我们面前，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只能靠我们自己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探索前进。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困难就是课堂，问题就是老师。暂时的曲折能够使我们学到很多在顺境中学不到的东西。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同心同德 振奋精神 艰苦奋斗。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进一步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特别是在廉政方面采取更切实有力的措施，把消极腐败现象限制在最

小的范围之内，努力维护和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创造更为良好、更为健康的政治环境，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社论还说，历史不会被割断。1989年是1988年的继续，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毕竟只是良好的祝愿。我们要通过团结奋斗，发展正面的、积极的、欢快的东西，使它们的比重越来越大；克服反面的、消极的、沉重的东西，使它们的比重逐渐降低。1989年一定会胜过1988年。

这篇社论，在这一关键时刻发表出来，意义非同寻常。它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对正在日益扩大影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注意不够，整个社论的语调也是相当灰色和相当沉重的，蕴涵着深深的担心。但是，社论对推进改革的决心仍然非常坚定。

与此相对应，党和政府在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也先后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1988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问题。差不多同时，还召开了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主要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课题。1989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加强政法工作、稳定社会治安问题。还召开了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提高纪律观念。总之，当时中央是在搞好治理整顿，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准备采取一些措施的。但可惜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打乱了这些部署。

对中国存在着乱的苗头、动乱的因素，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邓小平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针对三个不同的对象，发表了三次谈话。这三次谈话，今天看来真是意味深长。

1988年9月，他在谈话中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

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他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行了。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1989年2月，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不让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1989年3月，他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

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了党和政府的严正立场，一方面向一些人提出了严重警告，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党领导人民平息动乱指明了方向作了准备。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人死胡同，开始出现动荡。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夏以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如方励之等，攻击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了。他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评“反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

搞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也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等。搞自由化的一些人经常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

1月28日，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

方励之等人将矛头对准党和政府，阴谋搞乱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煽动下，西藏出现了新的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3月10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3月5日，

在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果断实行了戒严。

1988 年秋到 1989 年春，政治上两种对立的看法、立场已经逐渐公开。

2. 从胡耀邦逝世到‘四二六’社论

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出现了。

1989 年 4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1989 年 4 月 8 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 经全力抢救，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 7 时 53 分逝世 享年 73 岁。

胡耀邦的逝世在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悲痛，纷纷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深切哀思。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趁机利用人民对胡耀邦的纯洁感情，以及对通货膨胀、党内和社会上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积极策划大规模的动乱，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 1987 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后，就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为他打抱不平。而此时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更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蛊惑人心的谎言，这对于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来说，不啻火上浇油，悼念活动很快就演变成政治示威。

4 月 16 日、17 日，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首都高校生及各界群众有数万人之多，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开始出现悼念的花圈。一些高校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署名的挽联、标语、口号、传单和大小字报 批评政府 反对腐败 为胡耀邦鸣不平。据国家教委 4 月 16 日统计：“北京有 17 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约 500 份。其中，属正常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占 80% 发泄不满的占 10%，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约占 10%”。

可见，初期正常悼念的仍占绝大多数。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后，在很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

4月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甚至不可收拾。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议：

(1) 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

(2) 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3) 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4) 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会议认为，大量的事实说明，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如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仅暂时的安定不可得，长期的安定更是不可能的。

4月23日，赵紫阳去朝鲜访问。4月24日晚8时，在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会议一致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

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社论指出，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犯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学生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只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社论最后号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篇社论，经新华社发通告，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刊登。“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天，北京、上海分别召

①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为坚决、迅速地制止动乱而斗争。上海市委决定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北京部分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仍打着横幅，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公安干警曾多次劝阻，但均未能奏效。这次游行长达10个小时，围观的群众很多，致使交通严重堵塞。

4月29日，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在团中央会议室，同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座谈和对话。

5月2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提出了关于对话的12条要求。就部分大学生递交请愿书。5月3日，袁木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5月4日，数万名高校学生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同时宣布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以致党和政府没有能够对动乱及早采取措施。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正在酝酿之中。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赵紫阳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他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他深信，事态将会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并认为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

题。这一谈话使一度回到教室的学生重新走上大街游行并越来越失去控制。

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并发表了“绝食宣言”。14日下午，中共中央、国务院派李铁映、阎明复等与学生座谈、对话。当日，天安门广场上有10多人晕倒，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即安排医护人员抢救。到15日，已有上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周围聚集着很多围观的人。广场上有百余人晕倒，他们立即得到政府和红十字会的救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劝说学生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一些高校领导和教师纷纷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珍惜身体，返回学校。但也有一些人不断到广场支持学生绝食请愿的行动。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欢迎仪式没有能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而改在机场举行。16日上午，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邓小平说，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在访问期间，杨尚昆、赵紫阳、李鹏也分别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会谈。18日《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但是，形势越来越恶化了。由于学生的绝食行动引起社会上部分人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

5月15日午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发表广播讲话，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

5月16日，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人数有数十万。600多绝食的学生被送到医院或在现场得到救护。当天下午，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到现场劝说绝食学生停止绝食，尽快返回学校。

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 停止绝食 尽快恢复健康。当天，北京各界百万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声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5月18日5时 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看望绝食病倒、住院治疗的高校学生。当天上午11时至12时，李鹏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李鹏指出，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经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李鹏呼吁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希望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

3. 平息政治风波

5月中旬以后，北京的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这迫使党和政府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 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迅速结束动乱 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

大会由乔石主持，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讲话。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在会上讲了话。杨尚昆说，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决定自5月20日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同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令，决定自5月20日10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北京市市民书，指出派部队到北京部分地区协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针对爱国学生的。希望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充分理解，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整个学潮和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在部队进城戒严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极大的障碍。5月19日宣布戒严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坏人和群众混在一起堵军车的情况，军队一直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时，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使一部分戒严部队受阻，并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战士的严重事件。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3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在北京城区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同时，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

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通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履行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社会安宁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连日来，极少数人制造谣言 恶意丑化、攻击部队 用极其恶劣的手段 挑拨人民群众和戒严部队之间的关系，煽动一些人堵砸军车、抢夺武器 殴打干部、战士 盘查、围攻军人 阻拦戒严部队的行动 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动乱。极少数人的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郑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拦截军车，阻拦、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勤务。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我们坚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号令 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 以身试法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①

6月4日4时30分，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政治风波的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6月3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为避免误伤好人，从3日下午开始一再发出紧急通告，劝说广大学生和市民不要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

^① 《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

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社会主义建设和 10 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全国就可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而不要做任何亲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串连，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二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 邓小平的“六九”讲话

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随同一起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李鹏、乔石、杨尚昆、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

在同大家一起合影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这

① 《人民日报》，1989年6月5日。

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的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庸俗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他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他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接着邓小平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说：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

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 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

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最后，邓小平指出：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照样干下去 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地方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要认真总结经验 对的要继续坚持 失误的要纠正 不足的要加劲。总之 要总结现在 看到未来。

邓小平这个讲话 迅速传达到全国党、政、军各部门、各机关，6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它既对政治风波进行了总结，又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布置，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 江泽民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

根据邓小平6月9日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9日至21